

# 民众“心中”和“眼中”的腐败<sup>\*</sup>

——框架阐释理论视角下民众腐败感知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徐法寅

**内容提要:**民众腐败感知与实际腐败状况存在差异并具有政治影响,因而,考察腐败感知形成机制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在强调外在信息因素的同时,现有研究虽然也开始关注民众认知方式的作用,但是仍未全面分析民众的腐败认知方式及其影响,也未考察外在信息与认知方式的关系。在戈夫曼的框架阐释理论、韦纳的归因理论和大众传播理论的基础上建立的“形成性框架阐释理论”和对调查数据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表明,民众的腐败感知是外在信息和阐释框架共同作用的结果,腐败界定的宽泛程度和对腐败的政策性归因倾向对腐败感知都有显著影响;而且,外在信息对阐释框架具有形成性影响,因此不仅会对民众的腐败感知产生直接效应,也会通过腐败观念和腐败归因对民众的腐败感知产生间接效应。这一分析在理论上提出的“形成性框架阐释理论”可以在一般意义上理解民众的社会感知,在实践上对于提高民众的清廉感知、促进政治稳定具有参考意义。

**关键词:**腐败感知 腐败观念 腐败归因 外在信息 阐释框架

## 一、引言

虽然民众的腐败感知会受到实际腐败状况的影响,但是受腐败隐蔽性、信息可得性等因素的影响两者也会存在明显的差异<sup>①</sup>。而且,与实际腐败状况相比,民众的腐败感知对政治支持、政治信任和政治稳定具有更加直接的影响<sup>②</sup>。因此,在党和国家大力反腐倡廉的背景下,学界也特别关注民众的腐败感知及其形成机制,以促进反腐倡廉工作发挥更大的政治效应。

由于民众对于腐败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间接信息形成的,因此很多研究都强调信息渠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社会分层视角下反腐败政策的政治效应研究”(17BSH084)的研究成果。

- ① Benjamin A. Olken, “Corruption Perception vs. Corruption Reality”,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Vol. 93, No. 7, 2009; Jason Ross Arnold, “Political Awareness, Corruption Perceptions and 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 in Latin American”, *Acta Politica*, Vol. 47, No. 1, 2012.
- ② 杜传贵:《试论反腐败与政治稳定》,《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William Mishler and Richard Rose, “What are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Trust?”,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34, No. 1, 2001; Mitchell A. Seligson, “The Impact of Corruption on Regime Legitimacy”,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64, No. 2, 2002.

道对民众腐败感知的影响,包括大众传媒信息、小道消息和互联网信息的影响<sup>①</sup>。也有学者认为,在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国家中,由于文化转型、制度不健全等原因,腐败可能会渗透到民众日常生活中,民众也可能直接接触到腐败行为<sup>②</sup>。因此,现有研究也强调腐败经历对于民众腐败感知的影响。

作为一种感知活动,民众腐败感知的形成包括自下而上的信息过程和自上而下的认知过程两个方面。因此,理解民众的腐败感知水平要对他们的认知方式进行考察。但是,强调民众腐败认知的现有研究还未全面考察民众的腐败认知方式及其对腐败感知的影响。因此,本研究将以戈夫曼(E. Goffman)的框架阐释理论、韦纳(B. Weiner)的归因理论和大众传播理论为基础提出“形成性框架阐释理论”,并对经验调查数据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不仅考察民众的信息渠道和阐释框架对腐败感知的直接效应,而且考察信息渠道通过阐释框架对腐败感知产生的间接效应。

## 二、文献综述和理论视角

现有研究从多个方面考察了腐败感知的影响因素,包括结构层面上的人口学特征、社会经济地位和价值取向,等等。从形成机制上来说,现有研究采用了两种视角:外在信息视角和内在认知视角。但是,现有研究还未全面考察民众的腐败认知方式及其对腐败感知的影响,也未说明外在信息和内在认知的关系。因此,本研究以戈夫曼的框架阐释理论、韦纳的归因理论和大众传播理论为基础提出“形成性框架阐释理论”,来说明外在信息和内在认知之间的关系及其对腐败感知的影响。

### (一) 现有研究中的两种视角及其不足

外在信息视角下的现有研究同时考察了直接信息和间接信息、正式信息和非正式信息对腐败感知的影响。有学者考察了影响清廉感知的三种机制:绩效机制、文化机制和信息机制;其中,所谓的信息机制就是作为直接信息渠道的腐败经历,包括行贿经历和索贿经历<sup>③</sup>。就间接信息而言,针对民众没有腐败经历却认为腐败严重的现象,一些研究强调腐败“传说”(folklore)的作用<sup>④</sup>。一项基于俄罗斯调查数据的研究表明,大众媒体信息和小道消息都对民众的腐败感知具有显著影响<sup>⑤</sup>。对于中国民众清廉感知的研究也表明,官方信息会提高民众清廉感知水平,而小道消息会降低民众清廉感知水平<sup>⑥</sup>。此外,强调外在信息的现有研究还同时考察了腐败信息和反腐败信息对民众腐败感知的影响。一项准实验研究比较了市委书记被调查和未被调查的地级市中公众的腐败感知,发现在市委书记被调查的地级市民众的腐败感知反而高于未被调查的市<sup>⑦</sup>。

① Rajeev K. Goel, Michael A. Nelson, and Michael A. Nareta, "The Internet as an Indicator of Corruption Awarenes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28, No. 1, 2012; Jiangnan Zhu, Jie Lu, and Tianjian Shi, "When Grapevine News Meets Mass Media: Different Information Sources and Popular Perception of Government Corruption in Mainland China",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46, No. 8, 2013.

② Samuel P.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 59—71; 李辉:《腐败经历与腐败感知:基于调查实验与直接提问的双重检验》,《社会》,2017年第6期。

③ 倪星、孙宗锋:《政府反腐力度与公众清廉感知:差异及解释》,《政治学研究》,2015年第1期。

④ Karl Gunnar Myrdal, *Asian Drama: An Inquiry into the Poverty of Nations*, New York: Pantheon, 1972, pp. 166—76; 袁柏顺:《公众腐败感知与民间传说——基于C市城区公众腐败感知调查的一项研究》,《公共行政评论》,2016年第3期。

⑤ Richard Rose and William Mishler, "Explaining the Gap between the Experience and Perception of Corruption", *Studies in Public Policy*, No. 432, 2007, <https://ssrn.com/abstract=2559710>.

⑥ 薛可、余来辉、余明阳:《媒体使用、政治信任与腐败感知》,《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1期;倪星、张军:《社会阶层地位与清廉感知:差异及解释》,《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⑦ 孙宗锋、杨丽天晴:《“打老虎”如何影响公众腐败感知差异?——基于广东省的准实验研究》,《公共行政评论》,2016年第3期。

民众社会感知的形成也涉及自上而下的认知过程,而且民众的认知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会决定其对外在信息的解读<sup>①</sup>。内在认知视角下的现有研究强调民众的腐败认知方式对其腐败感知的影响,弥补了外在信息视角的不足。

现有研究中,内在认知视角主要体现在对“腐败容忍度”的考察上。有学者将“腐败容忍度”作为一种文化机制引入民众清廉感知的解释模型中,认为民众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接受贪腐行为会影响其清廉感知<sup>②</sup>。文化本质上是一个能够使行动者对情境进行界定和解释的意义体系和认知框架<sup>③</sup>,因此,作为一种文化机制的“腐败容忍度”,本质上是民众认知框架的组成部分。就其内容而言,现有研究对“腐败容忍度”的测量主要是针对民众的腐败界定进行的。比如,有学者通过民众对某些行为是否属于腐败的判断来测量腐败容忍度;这些行为包括“公职人员把办公室的纸和笔带回家使用”“公职人员为私人事务使用公车”“公职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为子女找工作”<sup>④</sup>,等等。

但是,内在认知视角下的现有研究还没有全面考察民众的腐败认知及其对腐败感知的影响,也没有具体说明认知方式与外在信息之间的关系。首先,现有研究中强调的“腐败容忍度”主要是指民众的腐败观念,即民众对腐败的界定,但是还未考察民众腐败认知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民众的腐败归因,即民众对腐败的解释。归因理论及相关经验研究表明,人们的归因方式会影响他们对现实的判断、期望、情绪和行动<sup>⑤</sup>。其次,现有研究还未具体说明内在认知与外在信息的关系。从认知形成的角度看,如果说腐败认知是腐败感知的构成要素,那么我们仍然需要考察外在信息对认知方式的影响。

## (二)“形成性框架阐释理论”和研究假设

对于民众腐败认知与腐败感知的关系问题,欧文·戈夫曼的框架阐释理论(framing)具体说明了认知框架的内容和作用方式,为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工具<sup>⑥</sup>。但是,戈夫曼的理论强调具体情境中阐释框架对信息的阐释,却不足以理解阐释框架的形成。因此,考察外在信息、认知方式和腐败感知的关系,还需要建立一个“形成性框架阐释理论”。

第一,与关于腐败容忍度的现有研究一致,戈夫曼的框架阐释理论强调行动者对事物的界定及其对感知的影响。在戈夫曼看来,阐释框架是行动者的视角;这种视角被用来识别、界定和理解行动者面对的“现实”,因此可以影响他们的判断和行动。阐释框架首先包含对事物的“界定”,从而可以让行动者识别具体情境中的事物“是什么”。阐释框架之所以会决定行动者对事物的“界定”,是因为他们能够以“转调借用”(keying)和“认知操纵”(fabrication)的方式将阐释框架应用于具体情境中<sup>⑦</sup>。同样,由于“腐败”概念的内涵具有很大的弹性,考察民众对腐败的界

① M. J. Riddoch and G. W. Humphreys, “Object Recognition”, B. Rapp Ed., *The Handbook of Cognitive Neuropsychology*, pp. 45—74, Philadelphia: Psychology Press, 2001.

②④ 倪星、孙宗锋:《政府反腐力度与公众清廉感知:差异及解释》,《政治学研究》,2015年第1期。

③ Clifford Geertz,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pp. 4—5.

⑤ Bernard Weiner, “An Attributional Theory of Achievement Motivation and Emo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Vol. 92, 1985; Greg Schmidt and Bernard Weiner, “An Attribution-Affect-Action Theory of Behavior: Replications of Judgments of Help-Giving”,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Vol. 14, No. 3, 1988; Steven A. Sloman, and David Lagnado, “Causality in Thought”,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Vol. 66, 2015.

⑥ Jurgen Raab, *Erving Goffm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New Sociology of Knowledge*, New York: Routledge, 2019, pp. 63—65; Pamela A. Oliver and Hank Johnston, “What a Good Idea: Frames and Ideologies in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 *Mobilization*, Vol. 5, 2000.

⑦ Erving Goffman, *Frame Analysis: 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 43—45.

定尤为重要<sup>①</sup>。前期探索研究发现,民众会以“转调借用”的方式借用“腐败”来界定国家公职人员的很多行为(如办事拖沓、大吃大喝等)。此外,关于腐败容忍度的现有研究也测量和表明了民众对腐败界定的宽泛程度及其对腐败感知的影响。基于戈夫曼的框架阐释理论和关于腐败容忍度的现有研究,我们可以提出一个关于民众腐败界定和腐败感知的假设:

研究假设1: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民众对腐败的界定越宽泛,他们的腐败感知水平也越高。

第二,与归因理论一致,戈夫曼的框架阐释理论也强调行动者的归因方式对其判断和行动的影响。根据归因方式,戈夫曼区分出两种阐释框架:强调自然的、难以改变的因素的阐释框架;强调人为的、相对容易改变的因素的阐释框架。从第一种阐释框架来看,事物是由自然力量引起的,因而难以改变;第二种阐释框架则认为,事物是行动者的作为或不作为引起的,因而更加容易改变。人们虽然会同时考虑自然的客观性因素和人为的主观性因素,但是对其中一种因素的强调会引起对事物的不同判断<sup>②</sup>。就腐败现象而言,现有的理论也指出了导致腐败产生的两种因素:一种是类似于自然力量的、难以改变的人的本性和宏观的社会变迁等客观因素,即客观性归因;一种是相对容易改变的、人为的权力监督和腐败惩治等政策性因素,即政策性归因<sup>③</sup>。前期探索性研究发现,民众也持有这两种不同的腐败归因方式。此外,伯纳德·韦纳的归因理论认为,如果人们将事物归因于可以改变的因素(比如,个人努力),那么他们对事物的判断就会更加具有弹性;相反,如果归因于难以改变的因素(比如,个人天赋),那么他们对事物的判断就更加稳定<sup>④</sup>。同样,如果民众倾向于将腐败归因于可以改变的政策性因素,那么,他们也会认为腐败问题更加严重。基于戈夫曼的框架阐释理论、韦纳的归因理论,以及权力监督理论,我们可以提出一个关于民众对腐败的政策性归因倾向和腐败感知的假设:

研究假设2: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民众对腐败的政策性归因倾向越强,他们的腐败感知水平也越高。

第三,戈夫曼的框架阐释理论虽然能够说明认知框架对信息的阐释,但是不足以说明阐释框架的形成。戈夫曼关注的焦点是微观层次上互动秩序中阐释框架的作用机制,而不是社会组织和社会结构及其对阐释框架的影响。另一方面,关于大众传媒和互联网信息的研究表明:各种外在信息通过选取报道的内容传递着认知视角<sup>⑤</sup>;信息既会对感知和行动产生短期影响,也会对认知框架产生长期影响<sup>⑥</sup>。因此,理解社会感知还需要一个“形成性框架阐释理论”,不仅考察阐释框架对信息的处理,而且分析信息对阐释框架的塑造。

如前所述,外在信息视角下的现有研究虽然考察了民众的信息渠道对腐败感知的影响,但没

① Michael Johnston, "The Search for Definition: the Vitality of Politics and the Issue of Corruption",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Vol. 149, 1996; Carlo A. Briochi, *Corruption: A Short History*,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17, pp. 1—4; 高波:《廉洁拐点:世界难题与中国方案》,第11—12页,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

② Erving Goffman, *Frame Analysis*, pp. 21—23.

③ 徐喜林:《中国特色反腐倡廉基础理论研究》,第66—70页,中国方正出版社,2013年版;岳磊:《中国腐败行为的运作逻辑及其关系模式》,第22—37页,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④ Bernard Weiner, "An Attributional Theory of Achievement Motivation and Emo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Vol. 92, 1985.

⑤ Stefano Della Vigna and Kaplan Ethan, "The Fox News Effect: Media Bias and Voting",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22, No. 3, 2007; Daniel F. Stone, "Ideological Media Bias",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Vol. 78, 2011.

⑥ Peter Clarke and Eric Fredin, "Newspapers, Television and Political Reasoning", *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 42, No. 2, 1978; John R. Hibbing and Elizabeth Theiss-More, "The Media's Role in Public Negativity Toward Congress: Distinguished Emotional Reactions and Cognitive Evalua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42, No. 2, 1998; Teun A. Van Dijk, "Power and the News Media", D. Paletz Ed.,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nd Action*, Cresskill; Hampton Press, 1995, pp. 9—36.

有考察信息渠道对于腐败界定和腐败归因的影响。也就是说,现有研究考察了外在信息对腐败感知的直接效应,但还没有考察外在信息通过阐释框架而对腐败感知产生的间接效应。基于上述“形成性框架阐释理论”,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假设:

研究假设3:民众的腐败经历、官方信息和非官方信息等信息渠道不仅会对腐败感知产生直接效应,而且会通过影响腐败界定和腐败归因对腐败感知产生间接效应。

综上所述,关于民众腐败感知的现有研究虽然指出了外在信息和认知方式的影响,但是对认知方式的分析还不全面,也没有考察外在信息通过认知方式对腐败感知产生的间接效应。本研究力图在戈夫曼的框架阐释理论、韦纳的归因理论和大众传播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形成性框架阐释理论”,不仅考察外在信息和阐释框架对腐败感知的直接效应,而且考察外在信息通过阐释框架而对腐败感知产生的间接效应。图1呈现了本研究的理论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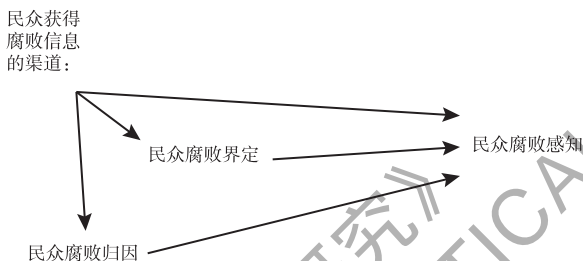


图1 民众腐败感知形成的理论模型

### 三、数据和方法

#### (一)数据来源

由于民众的腐败观念和归因方式涉及民众对国家公职人员的行为赋予的意义,本研究首先通过无结构化访谈进行了探索性研究。这些访谈有的是笔者在其他研究课题的调研中进行的,有的是笔者在日常聊天中进行的。从2016年到2019年进行的探索性研究中,访谈对象包括北京、四川、黑龙江、河南、山东、浙江、福建、湖南、山西、江西、贵州、宁夏等地的200余人,涉及国家行政人员、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及工人、私营企业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及工人、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农民等主流社会群体。

在对探索性研究中访谈资料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笔者又于2020年5月到6月进行了问卷调查。该调查分别从东北、北部、南部、中部、西部地区抽取了两个省(直辖市),又从各省(直辖市)中抽取一个省会城市和一个地级市。具体而言,调查数据包括了来自长春、大连、天津、威海、广州、宁波、长沙、南阳、兰州和达州的2500份问卷。在个体层面上,问卷调查在性别、年龄、户口和教育程度方面进行了配额,以包括不同的社会群体。

问卷调查的实施是通过网络调查进行的,使用的是北京益派数据有限公司的在线样本库<sup>①</sup>。为了保障数据质量,问卷调查对调查过程进行了严格的监控。首先,问卷调查对调查对象的IP地址、填答进度和填答时间进行了实时监控。根据试调查中的测算,调查实施过程对填答时间进

<sup>①</sup> 北京益派数据有限公司,2006年成立,建立了覆盖全国、对接全球的在线样本库资源。

行了严格控制,要求填答时间不少于30分钟(问卷中有43个题项)。其次,问卷中设置了五道测试题项。其中,一种测试题项要求调查对象选择指定的选项,另一种测试题项要求调查对象根据性别或年龄选择特定的选项。

## (二)变量说明

1. 民众腐败感知。本研究的因变量是民众的总体腐败感知。问卷的题项是“总体而言,您认为当前我国国家公职人员的腐败问题严重吗?”回答“不严重”“不太严重”“一般”“比较严重”和“非常严重”的分别赋值为1、2、3、4、5。由于本研究关心的是民众总体上的腐败感知,所以没有采用腐败测量的另外两种方式——民众对不同层级政府的腐败感知和对不同政府部门的腐败感知。现有研究表明,民众对于不同层级的政府——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和基层政府——的腐败感知和总体态度遵循不同的逻辑,因此很难用同一个指标进行测量<sup>①</sup>;民众对不同政府部门的信息和态度也会受到其他因素——权力的性质和运行方式——的影响,因此也难以用共同的指标进行测量<sup>②</sup>。此外,前期探索性研究也发现,民众对于不同政府部门和不同层级政府的职能分配和相互关系并不十分明确,也持有不同的态度。

2. 民众的腐败界定。如前所述,对“腐败容忍度”的现有研究测量了民众的腐败界定;而民众的腐败界定又是民众腐败认知的一个重要组成要素。因此,对民众腐败界定的宽泛程度的测量,本研究也采用了现有研究中对“腐败容忍度”的测量方式。在探索性研究的基础上,问卷调查列出了访谈中被界定为腐败的行为方式,并询问调查对象是否认为这些行为方式属于腐败行为。这些行为方式包括:贪污国家资产资金、向老百姓索要财物、收受贿赂、为私人事务使用公物、走形式讲排场、对老百姓态度恶劣、不求上进能力差。如果认为“不是腐败”,赋值为0;如果认为“是腐败”,赋值为1。然后将得分加总,得到腐败界定的宽泛程度。

3. 民众对腐败的政策性归因倾向。问卷调查列出了探索性访谈中发现的民众对腐败的归因方式,其中政策性归因——归因于权力监督和腐败惩治等政策性因素的归因方式——包括“腐败是由老百姓监管能力不足造成的”“腐败是由官官相护、层层贿赂的官场文化造成的”“腐败是由官员的权力太大、管得太多造成的”和“腐败是由反腐部门的反腐决心和力度不够造成的”。探索性访谈发现,与人性中的贪欲和宏观的社会变迁等因素相比,民众认为这些因素是可以改变的、人为性的因素。问卷调查询问了调查对象在多大程度上同意以上这些说法。“非常不赞同”“不太赞同”“一般”“比较赞同”和“非常赞同”的回答分别赋值为1、2、3、4、5。

4. 腐败信息渠道。对于腐败经历,问卷调查也采用了现有研究对于腐败经历的测量方式,询问了调查对象主动的请客送礼经历与被动的官员索贿的经历。题项分别是“最近几年里,您或您的亲友向公职人员请客送礼的情况多吗?”“最近几年里,您或者您的亲友遇到公职人员办事拖沓、索要财物的情况多吗?”回答“没有”“不太多”“一般”“比较多”“非常多”的分别赋值为1、2、3、4、5。

对于民众的间接信息渠道,问卷中的题项是“在了解时政信息时,你对下列信息渠道的使用情况如何?”其中列出的官方渠道包括:(1)政府网站和官方微信、微博;(2)电视、广播、报刊等大众传媒。非官方渠道包括:(1)非官方的微信公众号和新浪微博等自媒体平台;(2)与亲戚、朋友

① 倪星、李珠:《政府清廉感知:差序格局及其解释》,《公共行政评论》,2016年第3期;管明:《政治信任的层级差异及其解释:一项基于大学生群体的研究》,《公共行政评论》,2012年第2期。

② Pirtr Sztompka, *Trus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141—142; Mark E. Warren, “Trust and Democracy”, Eric M. Uslaner,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Trus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 75—94.

的面对面聊天;(3)外媒渠道。回答“从不使用”“很少使用(每周会使用1—2次)”“偶尔使用(每周会使用3—5次)”和“经常使用(几乎每天都使用)”分别赋值为0,1.5,4,6.5,然后加总来测量两种信息渠道的使用情况。

5. 控制变量。本研究控制了性别、年龄、户口、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反腐败成效评价等变量。性别为虚拟变量,女性取值为1。户口为虚拟变量,城市取值为1。受教育程度中,小学及以下取值为6,初中取值为9,高中取值为12,大专取值为14,大学本科取值为16,硕士及以上取值为19。政治面貌为虚拟变量,中国共产党党员取值为1。对于民众的反腐败成效评价,调查问卷询问了调查对象“在您看来,当前我国反腐败工作的总体效果怎么样?”回答“没有效果”“效果不大”“一般”“比较有效”“非常有效”的分别赋值为1、2、3、4、5。表1展示了以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1 变量的描述统计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样本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因变量	民众腐败感知	2500	1	5	3.42	1.03
自变量	腐败界定的宽泛度	2500	2	8	6.71	1.47
自变量 (民众对腐败的政策性归因倾向)	老百姓监管能力不足	2500	1	5	4	0.94
	层层贿赂的官场文化	2500	1	5	4.058	0.93
	官员的权力太大	2500	1	5	4.0628	0.87
	反腐决心和力度不够	2500	1	5	4.0728	0.90
自变量 (信息渠道)	主动的请客送礼经历	2500	0	4	1.27	1.12
	被动的官员索贿经历	2500	0	4	1.05	1.01
	官方信息渠道	2500	0	12.5	9.02	2.92
	非官方信息渠道	2500	0	10	6.43	1.96
控制变量	性别(女性=1)	2500	0	1	0.43	0.50
	年龄	2500	16	65	35.94	12.60
	户口(城镇=1)	2500	0	1	0.75	0.44
	受教育程度	2500	6	19	14.34	2.40
	政治面貌(中共党员=1)	2500	0	1	0.20	0.40
	反腐败成效评价	2500	1	5	4.04	0.76

## 四、统计模型和分析结果

### (一) 统计模型

本研究的内容包括:(1)民众对腐败的政策性归因倾向的测量;(2)民众腐败界定、腐败归因、信息渠道对腐败感知的直接效应;(3)信息渠道通过腐败界定和腐败归因对民众腐败感知产生的间接效应。因此,本研究使用了结构方程模型对数据进行分析,以同时考察研究问题所涉及的测量模型和因果模型。图2展示了这个结构方程模型的核心变量及其结构关系和标准化系数。

图2的底部是这个模型中的测量部分,即对民众对腐败的政策性归因倾向的测量。其中,指标变量包括民众对以下说法的赞同程度:“腐败是由老百姓监管能力不足造成的”“腐败是由官官相护、层层贿赂的官场文化造成的”“腐败是由官员的权力太大、管得太多造成的”和“腐败是由反腐

部门的反腐决心和力度不够造成的”。图 2 的顶部是结构方程模型中的结构部分。这个模型除了考察信息渠道对腐败感知的直接效应,还考察了信息渠道通过腐败界定和腐败归因所产生的间接效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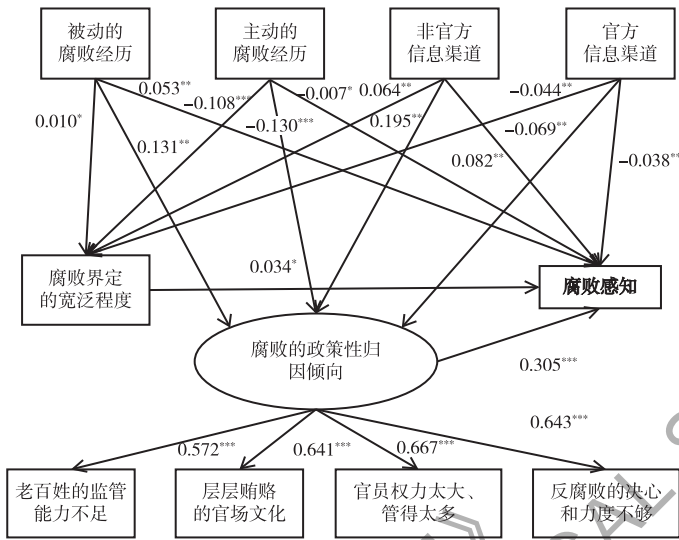


图 2 民众腐败感知的结构方程模型

注释:(1)为了显示模型的核心变量,本图略去了模型估计时使用的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户口、政治面貌、受教育程度和反腐败成效评价。(2)本图报告的是标准化系数;统计结果分析部分将报告模型包含的非标准化系数。(3)\*表示系数在 0.1 水平上显著;\*\*表示系数在 0.05 水平上显著;\*\*\*表示系数在 0.01 水平上显著。

## (二) 民众对腐败的政策性归因倾向的测量模型

将腐败的政策性归因倾向纳入结构方程模型之前,本研究首先对其测量模型进行了验证性因子分析。由于个别变量偏离了正态分布,因子分析同时使用了最大似然值估计方法和渐进性自由分布估计方法。两种估计方法得到的结果基本一致;估计模型与饱和模型比较分别为 8.01 和 7.16,没有显著差异。为了得到更全面的拟合度指标,验证性因子分析最终使用了最大似然值估计法。统计结果呈现了多种模型拟合度指标,包括估计模型与饱和模型比较、独立模型与饱和模型比较,比较拟合指数 CFI、近似误差均方根 RMSEA、标准化残差均方根 SRMR 和塔克-刘易斯指数 TLI。在验证性因子分析的基础上,本研究还测算了科隆巴赫效度指数  $\alpha$ 。表 2 呈现了验证性因子分析的结果。

表 2 民众对腐败的政策性归因倾向的验证性因子分析

潜变量	指标变量	非标准系数(B)	标准系数( $\beta$ )
民众对腐败的政策性归因倾向	老百姓监管能力不足	1 ***	0.572 ***
	层层贿赂的官场文化	1.11 ***	0.641 ***
	官员权力太大、管得太多	1.09 ***	0.667 ***
	反腐败的决心和力度不够	1.08 ***	0.643 ***

注释:(1)模型拟合度指数包括估计模型与饱和模型比较 = 8.01;独立模型与饱和模型比较 = 2602.73;比较拟合指数 CFI = 0.997;近似误差均方根 RMSEA = 0.035;标准化残差均方根 SRMR = 0.011;塔克-刘易斯指数 TLI = 0.990。(2)科隆巴赫测量效度指数  $\alpha = 0.72$ 。(3)\*\*\*表示系数在 0.01 水平上显著。



统计结果显示,这个测量模型的科隆巴赫值  $\alpha$  为 0.72,略低于传统上通常采用的标准值 0.8,但也远高于传统上采用的最低值 0.5。此外,比较拟合指数 CFI 为 0.997,高于传统上采用的标准值 0.9;近似误差均方根 RMSEA(0.035)和标准化残差均方根 SRMR(0.011),均低于传统上采用的标准值 0.05。综合考虑而言,这个测量模型较好地拟合了数据;指标变量较好地测量了民众对腐败的政策性归因倾向。

从理论上来说,之所以用民众监管能力不足、官场文化、官员权力太大、反腐败力度不够等指标变量来测量民众对腐败的政策性归因倾向,主要是因为:与人性的贪欲和宏观的社会变迁等因素相比,这些导致腐败的因素是更容易改变的。比如,反腐败的决心和力度是反腐败政策执行的主要因素,会受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呈现波动性<sup>①</sup>。同样,前期探索性访谈发现,民众也认为这些是相对容易改变的因素。他们认为政府可以为民众提供更完备和安全的监管渠道,可以通过制度建设减弱官员的自由裁量权和减少行政审批事项,也可以紧紧盯住一把手的选人用人以打破官员之间的利益关系。

### (三) 民众腐败感知的结构模型

在验证性因子分析的基础上,本研究又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民众的腐败感知进行了统计分析。与测量部分一样,由于部分变量偏离正态分布,结构方程模型的估计也同时使用了最大似然值估计方法和渐进性自由分布估计方法。两种方法结果基本一致:最大似然估计方法中,估计模型与饱和模型的比较为 156.971;渐进性自由分布估计方法中,估计模型与饱和模型的比较为 157.850。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使用了最大似然值估计法,以呈现更多的拟合度指数。统计结果显示,虽然估计模型与饱和模型的比较指数为 156.971,但是比较拟合指数 CFI(0.952)和塔克-刘易斯指数 TLI(0.908)都高于传统上采用的标准值 0.9,近似误差均方根 RMSEA(0.035)和标准化残差均方根 SRMR(0.024)也都低于传统上采用的标准值 0.05。因此,这个结构方程模型总体上较好地拟合了数据。结构方程模型的估计也将测量模型中“老百姓监管能力不足”的因子系数限定为 1,从而使结构方程模型的测量部分与验证性因子分析一致,而且能够对结构模型中的各个变量进行显著性检验。表 3 展示了结构方程模型中结构部分的非标准化系数。

表 3 民众腐败感知的结构方程模型的统计结果

因变量	自变量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体效应
腐败感知	腐败界定	0.024 *	-	0.024 *
	政策性归因	0.589 ***	-	0.589 ***
	官方信息	-0.013 ***	-0.008 ***	-0.021 ***
	非官方信息	0.044 ***	0.033 ***	0.077 *
	主动腐败经历	-0.007	-0.023 **	-0.030 *
	被动腐败经历	0.054 ***	0.041 ***	0.095 ***
腐败界定	官方信息	-0.022 **	-	-0.022 **
	非官方信息	0.048 ***	-	0.048 ***
	主动腐败经历	-0.142 ***	-	-0.142 ***
	被动腐败经历	0.014 *	-	0.014 *

① 聂辉华、王梦琦:《政治周期对反腐败的影响——基于 2003—2013 年中国厅级以上官员腐败案例的证据》,《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4 年第 4 期。

续表

因变量	自变量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体效应
政策性归因	官方信息	-0.013***	-	-0.013***
	非官方信息	0.054***	-	0.054***
	主动腐败经历	-0.034***	-	-0.034***
	被动腐败经历	0.067***	-	0.067***

注释:(1)模型拟合度指数包括估计模型与饱和模型比较 = 156.971;独立模型与饱和模型比较 = 2551.012;比较拟合指数 CFI = 0.952;近似误差均方根 RMSEA = 0.035;标准化残差均方根 SRMR = 0.024;塔克-刘易斯指数 TLI = 0.908。(2)\*\*表示系数在 0.1 水平上显著;\*\*\*表示系数在 0.05 水平上显著;\*\*\*\*表示系数在 0.01 水平上显著。(3)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和反腐败效果评价。

首先,就民众腐败认知和腐败感知的关系而言,结构方程模型的统计结果显示,在控制了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反腐败效果评价和外在信息之后,民众的腐败观念和腐败归因对腐败感知水平仍有显著影响。虽然民众腐败界定的宽泛度的影响较小,但也显示民众的腐败观念越宽泛,腐败感知水平越高( $\beta = 0.034$ ;  $B = 0.024$ )。现有研究所忽略的民众腐败归因因素发挥着更大的显著影响;民众对腐败的政策性归因倾向越强,腐败感知水平越高( $\beta = 0.305$ ;  $B = 0.589$ )。这也从腐败界定和腐败归因两个方面验证了民众的阐释框架对腐败感知水平有显著影响的假设:民众的腐败感知不仅依赖于他们所接受的外在信息,而且依赖于他们应用认知框架对外在信息所做的阐释。民众对外在信息的阐释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他们对腐败界定的宽泛程度会影响他们对腐败信息的选取,而且界定越宽泛,选取的信息也越多,感知到的腐败水平也越高;另一方面,他们对腐败的政策性归因倾向会影响他们对腐败信息的解释,而且政策性归因倾向越高,他们就认为腐败发生的可能性越大,感知到的腐败水平也越高。

其次,就外在信息对阐释框架的影响而言,民众腐败观念和腐败归因的分析都说明外在信息对阐释框架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但是,我们也发现不同的信息渠道会对民众的腐败界定和腐败归因产生不同性质的影响。在直接信息渠道(腐败经历)中,主动的腐败经历(行贿)会降低民众腐败界定的宽泛程度( $\beta = -0.108$ ;  $B = -0.142$ ),也会减弱民众对腐败的政策性归因倾向( $\beta = -0.130$ ;  $B = -0.034$ )。被动的腐败经历(被索贿)则会增加民众腐败界定的宽泛程度( $\beta = 0.010$ ;  $B = 0.014$ ),也会增强民众对腐败的政策性归因倾向( $\beta = 0.131$ ;  $B = 0.067$ )。在间接信息渠道中,官方信息会降低民众腐败界定的宽泛程度( $\beta = -0.044$ ;  $B = -0.022$ ),也会减弱民众对腐败的政策性归因倾向( $\beta = -0.069$ ;  $B = -0.013$ )。非官方信息则会增加民众腐败界定的宽泛程度( $\beta = 0.064$ ;  $B = 0.048$ ),也会增强民众对腐败的政策性归因倾向( $\beta = 0.195$ ;  $B = 0.054$ )。

外在信息对阐释框架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阐释框架的形成性。关于大众传媒和互联网信息的研究表明:各种信息包含和传递着认知视角,既会对感知产生短期影响,也会对认知框架产生长期影响。就民众的腐败感知而言,民众的认知框架会通过信息阐释而影响他们的腐败感知;但是,民众的阐释框架本身也会受到信息所包含的认知方式的影响。阐释框架的形成性也超越了戈夫曼的框架阐释理论,因为戈夫曼并没有在社会背景中对阐释框架本身进行解释。

最后,就外在信息对腐败感知的影响而言,结构方程模型不仅考察了外在信息对民众腐败感知的直接效应,而且考察了腐败认知产生的间接效应。统计结果显示,信息渠道对民众腐败感知不仅具有显著的直接效应和总体效应,也具有显著的间接效应。有些信息渠道,如主动的腐败经历,间接效应还大于直接效应。从总体效应上来看,本研究得出的结论与现有研究基本一致。但是,本研究区分了外在信息对民众腐败感知所产生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从而更加具体地说明

了信息渠道影响腐败感知的逻辑机制。腐败感知是外在信息和阐释框架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时,阐释框架本身会受到外在信息的影响,外在信息也因此会对腐败感知产生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

## 五、理论和政策启示

在强调外在信息因素的同时,现有研究虽然也开始关注民众腐败认知对腐败感知的作用,但是还未充分考察腐败认知和外在信息的关系及其对腐败感知的影响。本文以戈夫曼的框架阐释理论、韦纳的归因理论和大众传播理论为基础提出的“形成性框架阐释理论”和对调查数据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说明:(1)民众的腐败感知是外在信息和认知框架共同作用的结果,腐败界定的宽泛程度和对腐败的政策性归因倾向对腐败感知具有显著影响;(2)民众的阐释框架具有形成性,信息渠道会影响腐败界定和腐败归因;(3)民众的信息渠道不仅会对腐败感知产生直接效应,也会通过腐败观念和腐败归因对腐败感知产生间接效应。这一分析在理论上可以在一般意义上理解民众的现实感知及其与外在信息和阐释框架的关系,在实践上对于提高民众的清廉感知、促进政治稳定具有重要实践意义。

### (一)理论启示:形成性框架阐释理论

本研究所提出的“形成性框架阐释理论”不仅强调阐释框架对外在信息的加工和解读,也强调外在信息对阐释框架的形成性影响。这突破了只强调阐释框架的解读作用的“演绎性框架阐释分析”。演绎性框架阐释分析假定阐释框架是给定的,然后分析阐释框架在信息加工中的作用。戈夫曼对日常生活中阐释框架的研究体现了这种演绎性框架阐释分析,因为他认为个人对经历的解读是基于既定的阐释框架进行的。对政治文献的内容分析、媒体信息生产过程的研究和社会运动中的信息加工过程的研究也体现了这种演绎性框架阐释分析,都旨在发现信息加工过程中蕴含的既定阐释框架<sup>①</sup>。

但是,演绎性框架阐释分析并没有考察阐释框架的形成和变化及其社会结构背景和社会过程。很多学者虽然指出戈夫曼的框架阐释理论为连结微观和宏观社会现象提供了基础,但是往往仅强调阐释框架对整体社会秩序发挥的功能,而没有说明社会过程对阐释框架的影响<sup>②</sup>。针对戈夫曼理论的非历史性、非制度性,诺曼·邓辛(Norman Denzin)号召将戈夫曼的互动秩序理论与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因素联系起来<sup>③</sup>。但是,在具体的分析中,这种努力又陷入了结构决定论。比如,赫伯特·威廉(Herbert Willems)用布迪厄(P. Bourdieu)的“场域-惯习”理论说明阐释框架的形成过程,这就变成了约翰·帕克(John Parker)所说的一元论式的结构决定论<sup>④</sup>。

“形成性框架阐释理论”不仅强调阐释框架对信息的加工,而且强调信息对阐释框架的塑造;由于信息本身是社会结构和社会过程的产物,因此可以通过信息渠道将微观的阐释框架和宏

① Carlo Ruzza, “Frame Analysis”, Keith Brown, ed., *Encyclopedia of Language & Linguistics*, Oxford: Elsevier, 2006, pp. 607—610; Robert D. Benford and David A. Snow, “Framing Processes and Social Movements: An Overview and Assessment”,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26, 2000; Genevieve Johnson, “The kids are all White: Examining Race and Representation in News Media Coverage of Opioid Overdose Deaths in Canada”, *Sociological Inquiry*, Vol. 90, No. 1, 2020.

② Bennett M. Berger, “Forward”, Erving Goffman, *Frame Analysis*,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xi—xviii; James J. K. Chriss, “Goffman as Microfunctionalist”, A. Javier Treviño, ed., *Goffman's Legacy*,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3, pp. 181—196.

③ Norman K. Denzin, “Much ado about Goffman”, A. Javier Treviño, ed., *Goffman's Legacy*,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3, pp. 127—142.

④ Herbert Willems, *Rahmen und Habitus*, Frankfurt: Suhrkamp, 1997, pp. 182—192; John Parker, *Structuration*, Buckingham and Philadelphia: Open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77.

观的社会过程连结进来。这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结构决定论对阐释框架的简单化解释,更加具体地说明了阐释框架在社会背景中的形成过程和作用机制。

## (二) 政策启示:反腐实践、政治沟通和廉洁文化

在党和国家大力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且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的背景下,对外在信息、阐释框架和腐败感知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对于推进反腐倡廉工作和提升民众的清廉感知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首先,反腐倡廉实践要强调文明执法。调查结果显示,被动的腐败经历对于民众的腐败观念、腐败归因、腐败感知都具有显著影响。所谓被动式腐败经历就是在公职人员的示意或要求之下民众经历的腐败。访谈发现,这种腐败经历也有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即民众会在主观上将公职人员的某些行为界定为腐败的信号。很多访谈对象将公职人员“态度不好”“办事拖沓”等行为视为腐败,因为他们认为这些行为都是“官员在索要好处”。为了与典型的腐败行为区别开来,有些学者将这些行为称为“作风问题”和“亚腐败”<sup>①</sup>。但是,在民众眼中,这些行为也是腐败或腐败的信号。今后的反腐倡廉工作要规范公职人员与民众的日常交往行为,通过开展文明执法活动,提升公职人员与民众日常交往的文明程度,消除民众的误解,提高民众的清廉感知。

其次,反腐倡廉实践要加强政治沟通。关于间接信息的分析表明,在大力推进反腐倡廉实践的同时,发挥反腐倡廉工作的政治效应还需要加强舆论引导,通过信息公开和主流媒体满足民众的信息需求。现有研究也指出了媒体信息对民众腐败感知的影响。但是,这些研究还没有说明信息是如何影响民众感知的,也没有说明什么样的信息会影响民众感知。本研究表明,为了让反腐败工作发挥更好的政治效应,媒体信息要从信息和知识两个方面加强引导:从信息的直接影响来看,媒体要在信息的层面上对反腐败工作的进程和成效进行更加详细的报道;从信息的间接影响来看,媒体也要在知识的层面上向民众解释腐败的性质和腐败产生的客观背景,包括腐败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性、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的影响、社会高速发展中不可避免的规范缺失和制度漏洞、大国治理中遇到的普遍难题,等等。

最后,反腐倡廉实践要加强社会性的廉政文化建设。关于民众主动的腐败经历的分析表明,不自觉的腐败文化是社会转型期的一个重要特征;主动的腐败经历会降低腐败感知水平。这说明,在一些民众的眼中,“请客”“送礼”是常态。甚至有民众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办成事”。事实上在参与腐败,而主观上却不认为这是腐败;这是腐败文化的显著特征,即民众在思想认识上认同了这种行为方式<sup>②</sup>。腐败文化具有广泛性和顽固性,所以破除腐败文化和树立廉政文化需要党和国家的坚强领导和长远战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从社会的层面上将廉政教育活动推广至全体社会成员,而且清廉教育要从儿童抓起。

当然,本研究还存在一些缺陷,包括网络调查中样本的代表性问题、截面数据的因果解释问题,等等。因此,本文的研究结论也需要进一步的深化和完善。

作者:徐法寅,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北京市,100732)

(责任编辑:林立公)

① 卢汉桥、卢世慧:《公务员“亚腐败”现象的危害及成因分析述评》,《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8期;姚瑞平、刘祖云:《社会转型期作风建设:内在挑战、目标设定与实现路径》,《南京社会科学》,2019年第9期。

② Cris Shore and Dieter Haller, “Sharp Practice: Anthropology and the Study of Corruption”, Dieter Haller and Cris Shore, eds., *Corruptio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Ann Arbor: Pluto Press, 2005, pp. 1—28;任建明、胡光飞:《文化腐败:历史反思、特点分析及手段策略》,《理论视野》,2018年第9期。